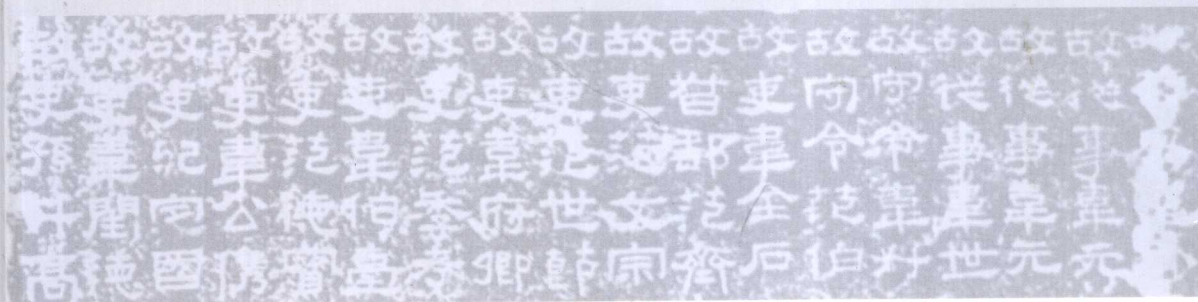




古刻新论

程章灿 著

404

中华书局

K877.404
C790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古刻新诠

程章灿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刻新詮 / 程章灿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4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578 - 7

I. 古… II. 程… III. 刻石文—文集 IV.
K877.4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947 号

书 名 古刻新詮

著 者 程章灿

丛 书 名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杨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578 - 7

定 价 43.00 元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总 序

程章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 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论证。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设计这个子课题时,我们主要着眼于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宏观思路的拓展,力图从大处着眼,以开拓我们的思维。但是,在这项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运用多年的学术积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不管这些进展是理论方法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或是对具体问题研讨的深入。因此,我们决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对各项历史文献展开整理、解读和阐释,不避小题,以避免不切实际的蹈空议论。也可以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我们相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构筑坚实的工作基

础,搭建良好的阐释平台,进而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方面基于心理情感以及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文化认同;同时,研究作为文献传承的知识支撑系统的目录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有助于追踪中国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思想框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既注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传世文献、儒家正统文献以及域内文献的传承研究,又重视对出土文献、非儒家文献以及域外文献的传承研究。关注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献,当然意味着文献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但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献视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观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眼光。

具体说来,这套丛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目录学及其历史发展为核心,探讨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文化框架渐次形成的过程及其特质,最终叩问中华民族文化之特质。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自叙》中早就说过,“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更明确指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徐有富长期致力于目录学研究,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规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中,经学无疑占有首要地位,相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经学目录在目录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长达三百卷的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它从目录学角度,对清初以前的经学著述之目及其分类、存亡、阙佚等情况详加考述,“源委详明,足称博瞻”,可称是一部集大成的经学目录。另一方面,作为朱彝尊“穷一生之力”完成的私家著作,《经义考》所建立的经学目录的新体系,在经学学术史上亦自具承先启后的意义。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一书,从文献著录与学术承传的角度对这一部专书条分缕析,论列甚详。

第二,以书院研究为中心,探讨书院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正如《书院与文化遗产》一书编者所强调的,“对书院史研究的重视,并不是在单纯保存文化记忆,而是在教育体制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中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这是众多书院研究者共同的人文关怀,也是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特别动机之一。从官学与私学的关系来

说,书院显然属于私学。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书院与研究私家书目颇为类似。研究私家书目,就是探讨中国传统目录学形成过程中有别并且独立于正统官修目录之外的另一个目录传统;研究私家书目与官修目录如何互动,就是探讨民间学术如何与官方学术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知识学术体系如何融合组成传统知识文化体系,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知识文化系统的构建等问题。在这套丛书中,《书院与文化遗产》有些与众不同。作为一部论文集,它既荟萃了包括胡适、聂崇岐、邓之诚、瞿宣颖等前辈学者在内的重要论文,又选录了近年学者的研究心得;而它的编者卞孝萱和徐雁平也同样属于两代学者——它从两个方面象征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

第三,从那些通常不太为人重视的文献入手,挖掘一些曾经受到忽略甚至被长期埋没的学术问题,探究这些文献中新的学术文化蕴涵。石刻文献、笔记小说文献、域外汉籍文献,都是以往研究中不大为人重视的。虽然从宋代以来,金石学便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风和学风的转变,关注石刻文献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对那些传世石刻文献,很多人似乎把它们遗忘了。实际上,不仅二十世纪新出土的石刻值得研究者注意,传世石刻中也仍然有许多意义空间有待开掘,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探索。《古刻新诠》是作者近十余年来所撰石学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中所谓“古刻”,既包括传世石刻,也包括新出土的石刻。书名中标明“新诠”,意在强调这两类石刻都有重新诠释的必要和前景,这也正是文化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书中考释涉及文学、语言、史学、艺术等领域,说明这种诠释正不必划地自限。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实际上也可以改题“古稗新探”。作者潜心研治唐五代笔记小说二十余年,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范围、唐五代笔记传承情况及其文化价值都有独到见解,对与此相关的正史与笔记、事实与虚构、当世记录与后代修饰等重要问题亦有深切理解。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包括总论、述要与具体考述三个部分,面、线、点相结合,考论相兼,无论是全局描述,还是微观考证,对于唐五代小说、历史及文化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要深入理解文献的意义,不仅需要了解文献自身的形成及其传承过程,也需要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积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小说研究基本上不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以降,小说研究才“升格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特色与个性之所在”。这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应该及时清理,其中的利弊得失亦有待总结。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二十世纪上半期、建国后三十年、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作了全面盘点,尤其突出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文献。小说的产生、存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有很大差异,小说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苗著从学术史角度所作的文献清理,显然有助于这两方面的正本清源。

对域外汉籍文献的重视,是本丛书的一个特色。《古刻新诠》中有长文考释《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也十分重视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并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论述宋集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的情况。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更是致力于发掘日本、韩国所藏唐宋文献,并利用域外访获的资料对中国固有文献进行订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有《帝王略论》、《李元宾文集》、《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多种。另一方面,作者还从出土文物以及法帖、墨迹等传世文物中,发掘并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唐宋文献。如果说文物是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出现的文献,那么,域外汉籍则是在另一种文化环境生存的文献。如果说文物指向的是物质文化与典籍文化的复杂联系,那么,汉籍在域外的承传,则往往是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密切关系的见证。

第四,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是本丛书的重点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宋代是由抄本时代真正进入刻本时代的转折点。无疑,刻本时代的到来对文献传承和文化繁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集的刊刻和流传,无论就其外部条件还是就其质量及数量而言,都远胜前代。《宋集传播考论》从宋集的编辑、刊刻、流传以及明清人对宋集的整理等方面,对宋集的传播作了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集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宋集的传播也就是宋文化的传播。在宋集之中,诗选颇为引人注目。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好讲学,好议论,也好选诗、评诗,加上刚迎来刻本时代,南宋诗歌选本盛极一时。甄选前代或当代的诗歌,甚或加以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文献传承的行为,而其成果便转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这些文献承载了当时人的诗学观念,承载了后人对前代诗歌文化的理解,记录了后人对再后人的影响痕迹,尽管其后来或存、或残、或佚,但通过对这些文献遗存的清理,我们观察南宋诗学之时,就可以占据一个更好的文献传承的视点。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重点考论的八种南宋诗选以及其他二十多种诗选,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不容小觑。与前两种著作不同,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则以史论文献的整理与阐述

为中心。“宋代是中国史学的颠峰,而史论正好契合了宋代的文学、史学、经学与理学等诸多学术问题。”史论据史事而发,集中体现当时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利用;又依经立论,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论说文体,其文章又呈现出文学化的诸多趋向。夸大一点说,宋代史论是一种跨越经、史、子、集四部的文体,遗憾的是,以往学者对此类文献关注甚少。孙著不仅有对两宋史论发展的线性描述,对史论的文学化与理学化也有颇为深入的剖析,很值得一读。

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目前都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多年以来,他们精诚合作,凝聚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坚持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学风,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本丛书就是部分团队成员的集体展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作者队伍中,既有寿逾耄耋而老当益壮的卞孝萱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人,还有年方而立的后起之秀。当然,读者们也不难看出,丛书中有少量成果是在课题开始之前完成的,这说明我们一贯的研究方向与这一课题旨趣不谋而合。整理典籍,阐释国故,发古典之新义,阐旧邦之新命,这是文献传承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目 录

《刘熊碑》新考	1
一、碑主身份生平考	1
二、碑刻时代考	7
三、书撰不出蔡邕考	11
读《张迁碑》志疑	17
一、《张迁碑》出土时地及其在明代之流传问题	17
二、《张迁碑》之语词及用典问题	21
三、碑文中的官名及其碑额体例问题	28
四、《张迁碑》的书法及汉碑的伪刻与重刻问题	32
《张迁碑》再志疑	37
一、前人对《张迁碑》的怀疑	37
二、汉人的书写态度与汉碑的书刻	40
三、补刻与翻刻问题	43
四、碑文文本的问题	47
五、小结	51
作为文本的汉代石刻——读《汉代石刻集成》	52
明僧绍与栖霞立寺史实考——重读《摄山栖霞寺碑》与《明征君碑》	61
一、明僧绍家世事迹及其南渡时间	61
二、明僧绍与栖霞寺的创立	64
《头陀寺碑文》所用佛典与《涅槃无名论》之真伪	70
一、《头陀寺碑文》所用佛典与僧肇	71
二、关于《涅槃无名论》真伪的争论	76
三、从《头陀寺碑文》李善注论《涅槃无名论》的真伪问题	78

读《六朝别字记新编》札记	82
一、鷁(鹏)	82
二、慙(整)	83
三、劣	84
四、族(秩)	85
五、狄(狄)	85
六、龙腓(膝)	85
七、钤(钤)	86
八、响曙	87
九、肱(肱)	87
十、发天河之悬濁	87
十一、雄(雄)	88
十二、禄力	88
十三、准阴豈存	88
十四、愚果	89
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	92
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续考	109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著录订补	115
一、著录有误,应订正者	116
二、著录不全,应补出者	118
三、系年有误,应是正者	124
四、年代失考,可考定者	125
五、拓本重出,应剔出者	128
唐代墓志丛考	129
一、《冯信墓志》应作《张信墓志》	129
二、《右军器使陈君暨东海县君徐氏合志》系年	130
三、《□伯饶墓志》考	131
四、《甘元柬墓志》考	131
五、《裴涓墓志》系年考	133
六、跋《郭思谟墓志》	133
七、跋《□君残墓志》	134

八、《陆广成墓志》考	135
九、《李铤墓志》当作《蒋铤墓志》	138
十、《□君墓志》即《张贞脊墓志》	139
十一、《崔沔妻王方大墓志》撰者考	140
十二、《杨公妻长孙夫人墓志》系年考	140
十三、《李庭玉改葬墓志》系年考	140
十四、《曹义墓志》重出	141
十五、《褚峰墓志》系年考	141
十六、《郑鲁墓志》系年考	142
十七、跋《刘致柔墓志》	143
十八、《孙备墓志》系年考	144
十九、咸通末二志应系乾符元年	144
二十、《唐代墓志汇编》重出篇目	145
 读《金石录》卷二十四札记	146
读《金石录》小识	160
 《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校考	164
一、释文校理	165
二、文献考证	175
三、文学价值	183
 石刻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刍论	190
一、集部辑佚的一大渊薮	190
二、文集校勘的宝贵资源	194
三、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史料	198
四、新材料与新认识	202
五、馀论	205
 读石随笔	
从金到石 从廊庙到民间——石刻的兴起及其文化背景	209
司马迁真有侍妾随清娱吗？——《随清娱墓志》辨伪	215
“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谈唐代宫女的命运	218
名人 名寺 名山——《明征君碑》与栖霞山栖霞寺的故事	223
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	228

4 古刻新詮

谁得了便宜?——碑志文潤筆及其他	233
透过字面看風波——讀《歐陽棐墓志銘》	238
數典而不忘祖——東南亞華文石刻一瞥(上)	244
紀年與正朔——東南亞華文石刻一瞥(下)	248
讀《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第一卷札記	254
後記	258

《刘熊碑》新考

在传世汉碑中,《汉酸枣令刘熊碑》(以下简称《刘熊碑》)颇为引人注目。究其原因,大略有四:一是此碑早在北魏就见诸文献记载,后来碑石失传,数百年之后其残石又复见于人间,身世堪称传奇^①;二是此碑据云出自汉代著名作家及书家蔡邕之手,然而究竟是否确实如此,争议颇多;三是关于碑主身份及碑石年代,虽然经历代名家考辨评说,仍未有定论;四是此碑文体及其铭文结构与众不同,引发或褒或贬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1916年,顾燮光所作《刘熊碑考》上下两卷初版印行,1918年再版,1934年三版,除附有原碑释文及图说之外,更辑录诸书考证及诸家题跋数十种,大致反映了一千多年来学术界围绕《刘熊碑》众声喧哗、众说纷纭的状况^②。尽管如此,不少问题迄今仍未有定论,尚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拟着重对《刘熊碑》的碑主身份、碑石年代及其是否为蔡邕书撰等问题,展开研讨。

一、碑主身份生平考

《刘熊碑》云:“君讳熊,字孟口,广陵海西人也。”“孟”下一字,至迟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泐不可辨。欧阳修与赵明诚二人所收此碑拓本已阙此字^③,洪适《隶释》卷五于此字下更明确注明:“缺”。按照《隶释》的体例,

①关于此碑尤其拓本的流传经过,参看少文《记刘熊碑兼蔡邕书碑问题》,《文物》,1966年4期。

②本文引录顾燮光《汉刘熊碑考》,据该书第三版,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5册。

③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俞乡侯季子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26。

凡注“缺”者，“止阙一字，如不止一字，皆注阙几字之数”^①。赵明诚首先利用《水经注》的有关线索，考明此阙字当是“阳”字。《金石录》卷十九《汉酸枣令刘熊碑》云：“《刘熊碑》在酸枣县，……按酈道元注《水经》，酸枣城内有汉县令刘孟阳碑。今据碑，熊实为此县令，然则所缺一字，当从《水经》为‘阳’也。”^②赵明诚的考证，既落实了碑主刘熊的名与字，又确认了刘熊酸枣县令的身份，并进而确定了此碑的题名，这是很有意义的发现。当然，这一发现与酈道元《水经注》的相关记载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水经注》是记录《刘熊碑》的年代最早的传世文献。众所周知，《水经注》中载录各地碑目甚多。一般来说，《水经注》载录碑目有两种体例：一是直称碑主之名字，如卷十七《渭水》记平阳“城北有汉邠州刺史赵融碑”，是称其名，卷六《汾水》记界休“城东有征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是称其字；一种是照录碑额上的题名，如卷二十三《阴沟水》记譙城有碑，“题云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③，总体来看，直称碑主之名者较多。对碑主称名或者称字，浑言之应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析言之又似乎有所不同——这究竟是纯粹出于偶然，还是寓有某种义例，今天似乎很难说清楚了。可以确定的是，酈道元对于《刘熊碑》是称字的。其原文称，酸枣“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④。这为赵明诚确认《刘熊碑》的碑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时代在赵明诚之前的欧阳修却没有注意到《水经注》中的这条材料，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和遗憾。究其原因，恐怕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是因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较多着眼于文章和艺术的角度，业余玩赏的色彩比较浓厚，不及赵明诚《金石录》那么着重史实考据，专业研究的态度比较鲜明^⑤。就《刘熊碑》而言，他并没有深究拓片来自何处，自然也就不会将此碑与《水经注》中的那段记载相联系。其子欧阳棐甚至误以为此碑在扬州，也从侧面表明了欧阳修不知此碑原在

①高文，《汉碑集释》（修订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07。

②《金石录校证》，页326。

③北魏酈道元著，谭属春、陈爱平点校，《水经注》，卷八《济水》，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页268，页90，页345。

④《水经注》，卷八《济水》，页118。

⑤参看拙撰《读〈金石录〉小识》，《金石录校证》，页562—567。今收入本书。

何地^①。客观方面,则是因为欧阳修当日没有见到碑额,《集古录跋尾》中只字未提碑额,就是证据。洪适说:“《酸枣令刘熊碑》,篆额右一行微有‘枣令刘’字,则知所题非十即八也。”可见他是见过篆额的。赵明诚说碑在酸枣县,若不是见过碑额,即是悉知此碑拓片之来历,亦或二者兼而有之。县名中含有“枣”字的,“酸枣”可谓绝无仅有,因此,“枣”字之前肯定有“酸”字,再根据汉代碑额常例推测,前面可能还有“汉”、“故”等一两个字。篆额两行字数一般相同,洪适据此推知篆额共有八字或十字。他又说:“欧阳公不知碑在酸枣,无以名其官,遂谓之《俞乡侯季子碑》。”欧阳修之子欧阳棐《集古录目》也沿用《俞乡侯季子碑》的题名^②,这当然是不够准确的,虽然“俞乡侯季子”也是刘熊的身份之一。

按碑文云:“清越孤竹,德牟产奇,诚宜褒显,照其宪则”,未涉及其换职或擢升之事,又无卒葬年月,则立碑之时,刘熊应仍在酸枣县令任上,此碑是酸枣县的门生故吏等为其所立,有碑阴诸多题名可证。从类型上说,这属于德政碑。实际上,欧阳修父子已经明确了这一点^③。郑樵称此碑为《酸枣令刘熊纪绩碑》,即有意突显碑刻的这一类型特质^④。但细读碑刻全文,除了碑额之外,未有一字具体提及刘熊的酸枣县令身份,只有“三祀有成,来臻我邦”等句,又“不书其郡县之名”^⑤。因此,如果不知此碑所在之地,又或未见此碑之碑额,那么,碑主的身份甚至名字恐怕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水经注》、《金石录》以及《隶释》的学术史贡献即此可见。

刘熊的籍贯是“广陵海西”。据《后汉书·郡国志三》,徐州刺史部下有广陵郡,郡之属县有海西,“故属东海”^⑥。其地在今江苏省东海县南部^⑦。欧阳棐声称《刘熊碑》在扬州,或许就是因为碑中有“广陵”二字而

①宋欧阳棐撰,《集古录目》,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按:《隶释》卷二十三辑《集古录目》一卷,卷末有洪氏跋语云:“其载碑碣所出,如《刘熊碑》在酸枣,而云扬州,《费泛碑》在湖州,而云南京,则有不可尽信者。”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二“扬州碑记”下录有《汉俞乡侯季子碑》,明显乃袭《集古录目》之误。

②《集古录目》卷二。

③《集古录跋尾》卷二,《集古录目》卷二。

④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三。

⑤《集古录目》,卷二。按:少文在前揭文中甚至觉得,碑文全然不提刘熊官酸枣令显得“滑稽”。但此碑当日既有碑额,则文中不复及之,亦未为不可。

⑥《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校点本,页3461。参看《汉碑集释》,页207。

⑦参看《汉代石刻集成》,页285。

想当然耳。碑文云：“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子孙享之。分原而流，枝叶扶疏，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载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①可知刘熊是东汉宗室之后，属于旁支别胤。碑文中的“广陵王”是指光武帝之子“广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明帝即位之后，因图谋作乱，被徙封广陵王，后代遂在那里落地生根。刘熊既然是光武帝之玄孙，就应当是广陵王之曾孙，而碑文却称为孙，未免自相矛盾。金石学者对此也有争议。《金石录》卷十九《汉酸枣令刘熊碑》有考云：

案《后汉书》，光武子广陵思王荆以谴死，显宗封其子元寿为广陵侯，又封元寿弟三人皆为乡侯。而李利涉《编古命氏》、《唐书·宰相世系表》皆云：“荆生俞乡元侯平，平生彪，袭封。”今据熊当为彪之弟。然则于光武乃其曾孙，而曰“玄孙”者，疑碑误。^②

清人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六《酸枣令刘熊碑》对此说提出异议：

熊迪功《补后汉同姓王侯表》云：广陵思王荆，永平十年自杀，永平十四年，侯元寿绍封，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其名阙。然则平其一也，至平子彪袭封，史无其年，亦未著其别有袭封乡侯亭侯之号，则安知其不仍封俞乡乎？是熊当为彪之子，不当为彪之弟，岂有光武元（玄）孙，出自本碑，转不足信，而信洪氏之臆断耶？^③

这里的“洪氏”指洪适，但严格说来，“臆断”的是赵氏而不是洪氏，因为《隶释》卷五只是引录赵说并表示同意而已。赵明诚引据的是唐宋时代的两种文献：《编古命氏》是初唐李利涉所撰姓氏书，书成于永隆二年（681）^④，《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列入乙部（史录）谱牒类；《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成书于宋初。翁方纲则援引宋人熊方《补后汉书年

①此处“君”字，在《隶释》中已阙，今据《集古录》、《金石录》二书所引补出。

②《金石录校证》，页326。按：《汉碑集释》（修订本）页208引《金石录》此节，误李利涉《编古命氏》为李利涉编《古命氏》。

③清翁方纲撰，《两汉金石记》，卷十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0册，页7440。

④宋王应麟撰，《玉海》，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汉碑集释》（修订本）页208引《金石录》此节，误李利涉《编古命氏》为李利涉编《古命氏》。

表》卷一《同姓王表》，年代虽然略晚于前两者^①，但所提供的文献其实并无不同，区别只在于是否承认碑文有误以及误在何处。赵明诚相信刘熊为广陵王之孙，由此推出刘熊与刘彪为兄弟的结论，并怀疑“光武帝之玄”之说误。翁方纲则采信刘熊为光武帝玄孙，并由此推出刘熊是刘彪之子的结论。由于不相信碑文本身也会出错，他对碑文自相矛盾这一十分昭著的问题也似乎视而不见了。

当然，除了习见的意义之外，“玄孙”还可以泛指远孙。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②这样理解，或许可以消弭碑文前后的矛盾。可惜，在汉碑以及《后汉书》中，我们似乎找不到这样的用例，而意为“曾孙之子”的玄孙则并不罕见。如《隶释》卷十《童子逢盛碑》：“童子讳盛，字伯弥，薄令之玄孙，遂成君之曾孙，安平君之孙，五官掾之长子也。”^③由于碑文前后自逆，加土文献不足征，判断赵、翁二说孰是孰非实在不容易。《汉碑集释》与《汉代石刻集成》对此二说并存而不加按断，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总之，按赵明诚的说法，“俞乡侯季子”中的“俞乡侯”是指刘平，而按翁方纲的说法，此人则是指刘彪。从表面上看，只不过姓名有一字之别，辈份亦仅相差一代，如斯而已，但此事攸关刘熊的身份，至今尚未能有确凿的结论，不免令人遗憾。

刘熊不见于正史，其生平仅见于《刘熊碑》。而历来研究《刘熊碑》的学者，却几乎没有涉及其生平者，或许是因为碑文本身有阙之故。然而，细读碑文，结合其他汉碑文本，刘熊生平至少尚有二事可考。

其一曰少为郡吏。碑文云：“既练州郡，卷舒委随，忠贞竭效，官□□□。”所谓“既练州郡”，殆指在州郡为吏，为将来仕途积累经验阅历。就学于京师，历练于州郡，是汉人初仕的典型经历，刘熊亦不例外。《汉碑集释》及《汉代石刻集成》注此句，皆引《汉书·韦贤传》：“昔靡不练。”又引颜注：“练，犹阅历之。”^④实则更应引证《隶释》卷五《汉成阳令唐扶

①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补后汉书年表》提要，熊方是南宋初年人。除《四库全书》本以外，《补后汉书年表》还有《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据开明书店原版重印。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页1826上。

③宋洪适撰，《隶释》，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页114上。

④《汉碑集释》，页209；《汉代石刻集成·本文篇》，页286。